

我與日本七十年

張羣



我與日本七十年

著者：張羣

發行所：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
出版者：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5號鴻霖大廈六樓A座

電話：七二一九六九〇・七二一九三四九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九五四三號

精裝全一冊 定價：美金六元
新台幣二元
港幣二十六元
日圓一、六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八五一號

電話：三二一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廿日再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日三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四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三十日五版



張羣字岳軍，四川人，生於民國前廿四年（一八八九）。與總統 蔣公同為保定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一期生，應考赴日留學陸軍獲取，先入東京振武學校，三年卒業後，同分發高田野砲兵第十九聯隊實習。民國前一年（一九一一），武昌起義後，偕同返國，參加革命。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及印尼等地。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回國參加第三次革命，成功後，曾先後在四川、河南等省任警務處長。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北伐軍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北伐完成後，任上海特別市市長，湖北省主席，外交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對日抗戰期間，初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後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重慶行營主任，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長，西南長官公署長官，總統府秘書長。現任總統府資政。曾任特使赴日本、韓國、教廷、賴比瑞亞等國參加慶典。接受美國伊利諾大學、聖若望大學、韓國漢城大學名譽法學博士，韓國成均館大學名譽政治科學博士及本國東吳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夫人馬育英女士，已逝世。女亞蘭，適劉博士毓棠——現任中國文化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長子繼正，現任行政院財政部長。次子繼忠，現任浸信會牧師。



民國前一年（一九一一），著者與總統 蔣公由

日本高田野砲第十九聯隊請假，經東京潛行回國
參加革命前，在東京攝影，迄今為時正七十年。

目 錄

第一章	前言	一
第二章	我和日本關係的開始	七
第三章	隨 蔣公訪日與田中義一會談	一九
第四章	濟南慘案的交涉	三四
第五章	我接任外交部長	四四
第六章	與川越茂八次會談	五六
第七章	對八年戰爭的痛感	八六
第八章	戰後訪日與麥帥四次會談	九六
第九章	發表「對日觀感」廣播詞	一一〇
第十章	中日和約	一二三
第十一章	和約簽訂後赴日報聘	一三八

第十二章	再度以特使名義訪日	一五三
第十三章	三訪日本	一六六
第十四章	三個不愉快事件及大野伴陸訪華	一七九
第十五章	吉田茂訪華與「吉田書簡」	一九七
第十六章	訪問日韓途中的日本之行	二一二
第十七章	三個「會」	二二五
第十八章	吉田茂逝世與週年紀念	二三六
第十九章	斷交前夕再訪日本	二四五
第二十章	結語	二五五

第一章 前言

我今年九十二歲，自從十九歲赴日本求學，即與日本朋友相交，上自天皇、首相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各界人士，都有過接觸，也交接了不少的日本朋友，真可謂「相識滿日本」，日本人也認爲我是他們的老朋友。至於政府間的關係，自從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誓師北伐以後，凡中日兩國間若干事件的折衝，我可說是無役不從。戰前如此，戰後亦復如此。不過在這七十年當中，儘管每個時期的情況不同，對象不同，然而我自與總統 蔣公赴日求學，一同加入同盟會後，即始終服膺 國父揭櫫的「大亞洲主義」，以促成中日合作親善爲基本原則。蔣公在戰前與戰後所制訂的對日政策，即係本此原則，而他之所以有關對日問題，大都要我參與，或任奔走之勞，也就是認爲我深切的瞭解他的主旨所在。然而，時至今日，回頭檢討，實有無限的辛酸與艱苦。大體說來，在七七事變以前，日本甚強，而中國甚弱。以弱對強，我方對日本種種無理的要求，接受則被認爲當然，拒絕則觸其憤怒，處於這種情勢之下，可說是軟硬兩難。在大戰爆發之前夕，我受任外交部長，先後與有吉明、有田八郎及川越茂三個大使談判。到了川越茂任大使時，竟經歷八次會談之多，對方緊鑼密鼓，凌

逼萬端，在漫長的時日與不斷的談判中，我既不能接受對方的要求，同樣也不能讓談判破裂，目的在爭取我們備戰的時間。在這一階段中，可說是千辛萬苦，心力交瘁。

中國對日建立真正合作親善的機會，乃是在日本戰敗之後，那時中國以戰勝國對日本的戰敗國，所有我方對日的寬大政策，才被日方體認為中國對日的真誠與德惠，才衷心願意和我合作。可惜那個時機，過於短促。在中國抗戰勝利以後，共匪即乘機擴大叛亂，竊據大陸；我政府播遷來台，時移勢異，雖然中日和約終於簽訂，但日本若干人士乃不免於趨向現實利益的觀點，幻想對大陸匪區的貿易，不免漸漸露出首鼠兩端的態度。最初是以民間關係來推行日匪貿易。在池田勇人主政時代，甚至不斷的發生幾件不愉快的事件，如本書中所述。到了岸內閣時代，乃不得不有所謂「政經分離」的說法，佐藤內閣可說是能盡力於維護中日合作關係，佐藤本人也曾偕其夫人來台晉謁總統 蔣公。到了田中角榮便悍然不顧一切與中華民國宣布斷交。

綜察日本對華政策，戰前與戰後兩個時期，各存不同的因緣。在戰前，日本軍人勢強，急於邀功，切望侵略中國，以增加其權勢，以操持國政。日本主政者，受軍人之脅持，不得不以外交手段幫凶。如果主政者對華政策緩和，便自身難保，所謂「二二六」事變，便是軍

人對主政者示威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到了戰敗以後，日本軍人勢力已經沒落，但日本在政壇上角逐的政客們，需要大量的財力支持，不得不仰仗工商界的援助。因此當政者的舉措，便受到工商業者的支配。那些工商業者在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覬覦大陸市場與物資原料，脅迫日本當政者採取親匪的一條路，結果日本就走上這條歧途，先是兩面敷衍，終於與我斷交。於是 國父的大亞洲主義的高遠理想，總統 蔣公所制訂之對日親善合作的國策，以及我個人數十年的目標，便愈來愈渺茫了。

在中日交涉的過程中，我只是致力中日兩國的真心合作，這是遵照國家的對外政策，而不是私人的行爲，所以個人之毀譽，在所不計。既然主張中日合作，首先必須了解日本，七十年之中，我多次訪問日本，與日本朝野各方人士接觸，目的即在深察日本政情與民情，本着這些了解，提供政府，作爲決定及推行政策的參考。同時，我與日本人士接觸，無時不以國父的理想及總統 蔣公對日政策的原則相告，希望他們對中日共同利害有深切的了解與正確的觀念。

根據近年中日關係轉變的情形來看，我七十年來的努力，目前是落空了。我對於此種逆勢，無疑的是感到失望，但並非絕望，更不會失去我的信心。世界上各國家的政策，人類的

行爲，路徑多條，但正路却只有一條。國父的亞洲主義，蔣公爲國家決定的對日政策，以及我七十年來對中日關係努力的方向，自信乃是一條正路。因之，我見之甚真，持之甚力。雖然日本方面，在戰前因爲軍人的貪功，戰後工商業者的貪利，使日本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步步走入歧途。但是這一條正路——大和民族與中華民族，在民主自由的共同意識下，攜手合作，以爲大亞洲主義實施之開端，以爲世界和平作東亞的砥柱，是無可置疑的。未來世界情勢的轉移，將證明日本現在所採取的對華政策是一條歧途，客觀情勢，將促使日本民族的覺醒，因而翻然改轍，終於走上中日合作的正路。此點，日本方面至今仍有若干遠見有識之士也同樣意識到。在中日斷交後，我雖然沒有再到日本去過，但日本若干朝野人士來中華民國訪問的，都要來和我談談，我還是一本初衷，和他們談中日應該合作之道，他們並不認爲我是在說教，足見他們心中所想的也未嘗不與我相同。我還記得在四年以前，當我的八十八歲生日將臨之前，因爲日本有三位和我同歲的元老，卽是石井光次郎、賀屋興宣、青木一男諸先生，許多日本朋友們，都希望能邀請我去日本，和他們三位共渡日本人在習慣上非常重視的「米壽」，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不便前往，因而石井、青木兩位先生竟「移樽就教」的和岸信介先生一同來到台北，賀屋先生則因身體不適未能前來。他們來了之後，由中日

合作策進委員會和亞東關係協會作主人，請我們幾個在圓山飯店設宴慶生，即席我們三人都發表的演講，仍然講的中日應該合作的大道理。賀屋先生雖不在座，而他在戰後增進中日關係所作之努力，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讓我在此再舉述一個實例吧。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日韓三國人士，共同發起了一個東北亞地區戰略情勢研討會。第一次會議在日本山梨縣舉行，同年十一月在東京召開第二次會議。去年（一九七九）四月在台北舉行第三次會議。日本方面，由日本前防衛廳長官金丸信率團出席。此次會議所得的結論，即是強調中日韓三國合作之必要，並主張邀請美國加入。今年一月又在美國華盛頓第四次開會，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普萊斯率領一個美國國會代表團，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並發表演說，該會所得結論，正是我們從來所倡導東北亞團結合作的主張。我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去日本訪問時，曾發表「中日關係與美國」的一篇文章，印成小冊，分送日本人士。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秋間分赴日韓訪問時，秉承總統 蔣公的意旨，促成日韓兩國的建交，並對日本當局及在公共集會中，主張中日韓三國加強聯繫，這與金丸信所說的一句名言「中、日、韓三國命運共同體」，其主旨亦復相同。這個研討會雖然只是一個民間組織，沒有政治上的拘束力，但是他們所獲得的結論，乃是

依據亞洲當前客觀形勢，以及中日韓三國的切身需要而來，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信必能喚起日本朝野有心人士的共同認識，遲早總會發生實際作用。這種旋乾轉坤的大業，本非一朝一夕之功，時勢的轉移，終會改變過去許多錯誤的想法和作法。目前世局的激遽變化，東北亞的安全問題已經在各個國家有了相同的警覺。我之所以對現階段的中日關係之只失望，而不表示絕望，其理由亦即在此。我更相信我七十年來的心力，終於不是白費的。

我於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經東京去磯谷應吉田茂先生午宴之約，在與吉田閒談時，他曾要我寫回憶錄，我告訴他，希望將來能有機會重赴當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與總統蔣公亡命日本時，所賃居的小濱「一角樓」，撰寫「中日關係五十年」。當時我雖有此資料，却因為個人職務與兩國關係，以現代人論述現代事，難免不涉及若干人事上的恩怨是非，所以不便着筆，於今事隔將近二十年，吉田茂先生早已逝世，兩國的外交關係亦已斷絕，我着手來寫這篇「我與日本七十年」，一方面可作爲一項近代史資料的補充；一方面我希望兩國人士看過之後，能了解中日兩國過去這段血淚交織的歷史關係，體驗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教訓，我更希望能以餘年盡其最大之努力，看到中日關係的重新恢復，以告慰於國父暨總統 蔣公在天之靈！

第二章 我和日本關係的開始

先總統 蔣公逝世前一年（民國六十三年），日本產經新聞社就總統 蔣公所寫的日記及所藏資料，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及日本外務省所藏的檔案史料，加以編著，發表了有關中日關係八十年的名著——蔣總統祕錄。全部是紀述中日兩國間的關係，包括兩次戰爭——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一九四五年結束之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外交折衝、條約簽訂，乃至中日和約後，中日親善合作，直到日本田中角榮內閣承認共匪偽政權與中華民國斷交為止。時間經過是八十年，我常說這八十年來的中日關係是一部血淚交織而成的歷史，自信此言不誣。很不幸的，我於今年逾九十，這一輩子也正處於這個時代，這一段血淚交織而成的史實，我是目擊身經。更明白一點的說，前十年我是「目擊」，後七十年則是「身經」。

我於清光緒十五年，即公元一八八九年，出生於中國四川省華陽縣。中日戰爭即發生在我五歲的那一年。當年照中國干支紀年的說法是甲午年，所以在中國近代史上亦稱為甲午戰

爭。時值朝鮮東學黨作亂，要推翻朝鮮的李氏王朝。滿清政府派葉志超等率軍前往援助朝鮮政府。日本早有併吞朝鮮的野心，因而也派兵進入朝鮮。及至亂事平定，日本軍隊不特不撤退，反而進據京城，并乘清軍不備，加以襲擊，結果敗清陸軍於牙山平壤，又擊敗清丁汝昌水師於大東溝外，日軍竟乘勝渡鴨綠江，進入奉天省境，連陷九連城、鳳凰城、旅順、大連、海城、復州、蓋平、營口各地。再自旅順渡海，進軍山東，又陷榮成、文登、威海衛、劉公島等處。接着又分遣海軍南下，佔領澎湖羣島，近逼臺灣。最後，滿清政府乃派李鴻章赴日議和，當時日本首相是伊藤博文，外相是陸奧宗光。馬關條約的重要條款是：（一）承認朝鮮爲自主國。（二）割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與日本。後因俄、法、德三國出面反對割讓遼東半島，由我國出款三千萬兩贖回。（三）賠款二萬萬兩。（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處爲通商口岸。按其內容，眞可說喪權辱國；據近代史所載，如果當時若非李鴻章在馬關被日人行刺受傷，則日本所要求可能比上述的條件還要苛刻。

到了一八九九年，又爆發了義和團之亂。次年五月，義和團暴徒進入北京，治安混亂，各國公使再三要求滿清政府制止，竟被置之不理。最後，各國只有決定派遣軍隊進駐北京。於是英、俄、法、德、美、日、義、奧等八國乃採取聯合行動，此卽所謂「八國聯軍」之役。

。日本得此機會，打算大規模出兵，以圖擴大對滿清政府的壓力和對各國的發言。六月十一日，日外相青木周藏對駐英代理公使松井慶四郎發出密電，告知日本打算增派軍隊，指示松井探詢英國政府的意向，當時英國政府以「希望和各國採取一致行動」而予以拒絕。戰爭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終於簽訂了又一次屈辱的所謂「辛丑條約」，即是賠款竟達四萬萬五千萬兩之鉅，日本分到其中百分之七點七三，計三千四百七十九萬餘兩。

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日本宣布和俄國斷交，八日在仁川、九日在旅順進行海戰；十日兩國同時宣戰。日俄兩國竟為爭奪中國的領土，也在中國的領土上進行戰爭，顛覆的滿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戰爭的結果，俄軍敗績，遂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簽訂樸資茅茨條約，而條約的內容，日本因戰勝俄國所得的利益，並非由俄國得來，而是將俄國過去在中國領土上所獲得的權益讓給日本。日本並根據此一條約，要求滿清政府簽訂所謂「滿洲善後協約」。日本的全權代表是小村壽太郎和駐華公使內田康哉，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日俄戰爭，是因為滿清政府對於盤據在東三省的俄國，拱手旁觀，無能為力，而由日本代勞，將之驅逐出去，所以滿清政府給予日本以報酬，是理所當然之事。」而且日本閣議決定，如果滿清政府不接受這個「善後協約」，日軍便照現狀繼續的佔領下去。此一談判自十一月十七日開始至